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 浪漫主义的根源

*Isaiah Berlin*


[英国]以赛亚·伯林 著 亨利·哈代 编 吕梁 等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 浪漫主义的根源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主义的根源 / (英) 伯林 (Berlin, I.) 著; 吕梁, 洪丽娟, 孙易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1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ISBN 978-7-5447-1576-8

I. ①浪... II. ①伯... ②吕... ③洪... ④孙...  
III. ①浪漫主义-研究 IV. ①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0519号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by Isaiah Berlin  
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and Henry Hardy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9-434 号

书 名 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 者 [英国]以赛亚·伯林  
译 者 吕梁 洪丽娟 孙易  
译 校 张箭飞  
责任编辑 陈 叶  
原文出版 Pimlico,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2  
字 数 142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76-8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握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艾伦·布洛克

# 目 录

编者序	001
一 寻找一个定义	009
二 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	028
三 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	051
四 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072
五 奔放的浪漫主义	096
六 持久的影响	119
参考文献	146
索引	165
校后记	181

## 编者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sup>①</sup>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sup>②</sup>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

---

① *Fifteen Sermons Preached at the Rolls Chapel*, 2nd ed., 'To which is added a PREFACE' (London, 1729), preface, p.xxix.

②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 p.197,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London, 1997; New York, 1998).



ix 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 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耽搁得太久，反而难以动手。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未完成稿”——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 1964 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  
x 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

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它,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sup>①</sup>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sup>①</sup> 伯林还考虑过其他标题,包括“普罗米修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研究”(这个题目具有嘲讽之意,很快就被放弃了)、“浪漫主义的兴起”、“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反叛”、“浪漫主义的起义”、“浪漫主义的革命”。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 1770 年到 1820 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个案——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某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某个人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说词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说词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夸大（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夸大（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乃至全部表象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不管其如何伪装,让浪漫主义作为其最强烈的表达和症状的那个革命。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sup>①</sup>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 BBC 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

---

<sup>①</sup> 这段伯林引文信屈聱牙的风格与他的行云流水的演讲风格大相径庭,显然,他对于一些说法颇为踌躇,他需要进行比较以便筛选出更好的描述,因此他频繁地使用插入语、同义词、并列词组(句)、补充说明词组(句),致使句子结构显得臃肿,意义累赘。译者在这里试图保留引文原文的风格。——译注

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sup>①</sup>

xiii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  
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sup>②</sup>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

① 伯林演讲所具有的那种高度个性的色彩和摄人魂魄的力量是其声望的核心部分,他的演讲录音特别值得一听。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以及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里国家声响资料档案部收藏了这个系列讲座的所有现场录音。(需要预约)

② 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衡量,这种不完全引用与无意识的袭用之间是很难区别的。西奥多·贝斯特曼在其翻译伏尔泰的《哲学词典》(Harmondsworth, 1971, p.14)的介绍中说:“现代人对于引文出处的那种忠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闻所未闻。伏尔泰的一些表明为直接引用的引文有时与原文并不一致。此种情况在维柯那里还要严重。正如《新科学》的译者托马斯·戈达德·伯金和马克斯·哈罗德·菲什在他们的一个修订版(New York, 1968)序言中写道:“维柯根据记忆引用;他的资料来源模糊不清;他的记忆常常不可靠,他所声称的一些出自第一手资料的引文往往得自间接的渠道;他还时常混淆了作者……”不过,尽管如此,正如译者在他们的1948年的译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维柯这些细枝末节方面的错误……并没有伤及他论点的要义”。

伯林的情况相似。他的引文也不精确,往往是已被他改进过的。我经常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乐意借机把自己嘲讽一通,一旦错用的事实得到确认,他总是坚持修正过来。虽然他对引文作过改进,不过并没有偏离引文作者的本意,甚至还使原文的意义更加清晰明确。当然了,若把伯金他们对于维柯的评价用到伯林身上,不免夸张了些。维柯是伯林谓之的智识英雄之一,他们之间在这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伯金和菲什说过,维柯最著名的编辑——福斯托·尼科利尼是以一种“苛刻的爱”来处理维柯的缺点的,显然这种编辑态度足资楷模。

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xiv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生前坚持拒绝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sup>①</sup>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 xv

<sup>①</sup> 1966年9月20日的信。

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 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sup>①</sup>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 150 页<sup>②</sup>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 年 5 月

---

① 引自伯林 1994 年为《北方的巫师》德文版特别所作的前言，参见 Isaiah Berlin, *Der Magus in Norden* (Berlin, 1995), p.14. [该前言的英文原文已被收入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London and Princeton, 2000)一书中]

② 此处页码对应的是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译注

## 寻找一个定义

也许你们期待我的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进入这个陷阱。杰出、睿智的诺思洛普·弗莱教授指出，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这个问题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吧，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姑且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吧，他们的态度完全迥异于拉辛和蒲柏的态度——就会有人从荷马史诗、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西班牙诗歌中，最终从拉辛和蒲柏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不准备归纳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般地涉足这个领域。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



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  
1 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思想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最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明,为了阐明该文明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其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以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或希腊文学为例。如果你阅读,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你会发现支配他的是一种几何或数学模式,很明显,他的思维原则基于如下的观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某种方法获得绝对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绝对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绝对的知识。几何学,或者说广义的数学,堪称这种绝对知识的范式,最完美的范式。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学科,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当然包括具有类似信念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及某些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纪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  
2 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知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